

对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的几点考察

袁 征

1935年6月,英国在欧洲局势日紧的时候同德国缔结了海军协定,这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长期以来,对于英国缔结此协定的动机、其外交政策的走向及此协定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文试图围绕《英德海军协定》作出几点考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动荡。大英帝国的利益在世界各地受到挑战,这突出地表现在远东和欧洲。在远东,日本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的东三省,并有高举南下的势头,这不仅违反了《九国公约》,也威胁着大英帝国的利益。在欧洲,德国希特勒极力鼓吹和煽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叫嚣去争夺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暗地里加紧扩充军队,强化军事训练,增加军事工业;而法西斯意大利在地中海周围一直要有所图,也是英国早已察觉的事实。面临德、日、意三个潜在的敌人,英国要保护它遍布世界各地的利益,同时对付这三国是不可能的,故需要找到一些盟友。而此时的大国中,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态度,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在英国人看来是不可靠的乃至邪恶的;唯一可靠的国家就只有法国,但法国当时困扰于经济危机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对德国的举止如畏猛虎。所有这些都使英国感觉到在维护和平的道路上形单影只。

面对外在的威胁,加强国防军事力量是极为必要的,但这遇到了两方面的阻力。其

一就是英国的经济却在此时陷入困境。20世纪初以来,英国经济每况愈下,实力不断下降,已难以支付必要的国防开支。这种致命的弱点到30年代完全暴露出来,使英国感到力不从心。在大危机的打击下,英国经济大衰退,国内失业人数剧增,阶级冲突日烈,使英国把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国内问题上,试图能平衡财政,等待经济的复苏。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要求进一步削减国防开支以平衡预算,从而逐步达到经济的复苏,而重整军备则应加以推迟,因为人们认为大量的军备开支将会使经济进一步恶化,重新出现1931年那样的严重危机。另一个障碍因素就是英国国内和平主义甚为盛行。在20年代末期,大量有关一战的书籍出版,不断宣扬战争的徒劳和恐惧、政治家的无能、人民的巨大牺牲等^①。这无疑影响和教育着广大的英国公众,而且一战所带来的痛苦依旧萦绕在英国人心头。大多数人认为一战是由于错误而开始的,一战后对德国的处置是不合理的,应加以修正;一战是由于大规模军备竞赛导致的,因而避免战争的方法是减少军备。人们信赖国联,认为在未来可通过国联这个谈判机制来防止战争,却从未想到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国联的力量,相反不区别地认为重整军备是一种敌对的政策,与国联的宗旨是相悖的。在当时,裁军变成至高的忠诚表现,这种情感在1932年2月裁军会议开幕后变得更加强烈。而这时,工党和自由党都大力宣扬和要求把裁军作为英国外交

^① A. J. P. 泰勒:《英国史1914—1945》,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65年版,第361页。

政策的主基点，并认为对凡尔赛和约应加以修正，因为它导致了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纳粹德国的出现。这种态度获得了英国选民的支持，在1933年和1934年的补缺选举中，工党反对军备使其选票大增。工党候选人约翰·威尔摩特(John Vilmot)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① 1935年5月工党的一位成员还说：“我们支持通过国联的集体安全，我们反对使用武力作为政策的工具。……我们的政策不是一种通过重新武装而是通过裁军来寻求安全。”^② 这种把裁军和集体安全混淆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严重的恐战情绪和强烈的和平愿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面对纳粹德国的崛起，他们不能酝酿出真正备战所必需的心理状态，而是一味地追求和平与安定，这深深地影响着国家事务。正如邱吉尔所言：“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对情况不了解或有错误了解的大多数英国人，并且对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或政治家似乎具有很大的压力，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③

经济的衰退，和平舆论的盛行，使英国在重整军备方面受到影响。1935年前，重整军备基本未提到日程上来，国防开支一直维持在低水平上。而英国为保护其在全球的利益，战线拉得很长，固有的军事力量在新形势下更显得力不从心，在其承担的保卫任务和能力之间出现不小的差距。正如保罗·肯尼迪评述道：“与它的潜在敌人相关连，大英帝国的反击力量比177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软弱。”^④ 这就使英国政府在制订和执行政策时缺乏强有力的后盾，使其政策的抉择受到了限制。

二

一个协定的达成，应是双方各有所图的产物。在我们对英德海军协定加以考察时，

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就是希特勒以其冠冕堂皇的欺骗之语向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发动了外交攻势，并对英国的公众舆论和政府产生了影响。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曾阐述了他的战略构想：回顾过去，他认为德皇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与英国为敌和妄想在海军力量方面同英国竞争”^⑤；并指出德国在未来的潜在朋友将是英国和意大利。在他上台后，以和平宣传欺骗英法等国，并注重拉拢英国就更为紧迫。此时希特勒德国正加紧扩充军备，而这是凡尔赛条约所严格禁止的，希特勒深深意识到这一举动的风险。他在1933年2月对国防军将领指出：“建设国防军的时刻是最危险的时刻。”^⑥，事实上威胁也的确是存在的，1933年3月波兰毕苏斯基元帅就向法国表示最好联合起来对德国进行一次预防性战争。德国此时的力量仍很薄弱，难以抵挡一场对德的预防战争，于是希特勒在秘密扩充军备的同时，对外侈谈和平，注重以此影响英国，利用英法在对德政策上长久以来的分歧，以达到分化对方阵线的目的。1933年5月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和平演说”，指出德国“并不想进攻别国，而只想谋求安全”^⑦。他宣称：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因为“一场新的欧洲战争不可能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上部，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3页。

② A.J.P.泰勒：《英国史》，第368页。

③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上部，第一分册，第163页。

④ 保罗·肯尼迪：《战略与外交1870—1945》，福特纳平装本，1983年版，第99页。

⑤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二)，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06页。

⑥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12页。

⑦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第297页。

带来比今天现有的令人不满的条件更好的东西……。发动这样一场疯狂的无休止的战争将导致欧洲现存秩序的毁灭”^①。这在国际上造成一个印象：希特勒是一个和平者。1933年10月，希特勒宣布退出国联和日内瓦会议，却很快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上希特勒十分憎恨波兰，并无诚意去遵守此约。他曾坦率地向其他纳粹领导人说：“所有我们同波兰的协定具有纯粹的、暂时的作用。我没有认真同波兰保持友好的意图。”^②他之所以订立此协定，不仅此举使法波关系出现裂痕，分化了法国精心构筑的安全体系，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来对付波兰，他就能够加强他的和平宣传，并且减轻由于他突然退出日内瓦会议和国联而在东、西欧造成的疑惧。不仅如此，希特勒还不断地通过外国新闻媒介传播他的“和平”攻势。如在1934年8月，希特勒通过英国《每日邮报》宣扬：“战争不会再来了”，德国“对战争造成的恶果比别的任何国家有更深刻的印象”，“德国的问题不能通过战争来获得解决”^③。1935年4月，英、法、意三国结成了斯特莱莎阵线，这使希特勒德国多少感到有些不安，于是希特勒又发表了一篇“和平”演说。他说他所要的只是在对各国都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的和平谅解；德国不要战争，希望和平。希特勒并提出了维护和平的13点具体建议，作出了多项保证。值得注意的是，在裁减军备方面，希特勒许诺准备同意英法为洛迦诺公约补充一个空军协定的建议。希特勒并向英国公开提出愿意把德国的海军限制为英国海军力量的35%，宣称“对德国来说，这个要求是最后的和不变的”^④。这些动听的谎言迎合了欧洲一些国家人民迫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心态，受到了他们的欢迎。伦敦《泰晤士报》就以欣喜若狂的态度评述道：“……这篇演说结果证明是合理的、直爽的和全面的。……希特勒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完全

可以构成彻底解决德国问题的基础。……我们希望，这篇演说将在各地都被认为是一篇诚挚而经过周密考虑的由衷之言。”^⑤

希特勒不断地发动其外交攻势，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向英国提出了缔结海军协定的建议，并利用英国国内和平舆论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做出对德政策抉择。

三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它卷入战争，不仅没有获取什么，反而失去更多东西的话，那么和平的存在将是其最高的国家利益。一战后的英国正是这样一个国家，由于力量的相对削弱，它在和平时期尚能勉强承担其帝国的保护任务，可一旦战争爆发，它就不能兼顾，在战争中失去的东西将比它得到的东西多得多。早在1926年英国外交部一份备忘录中，在列举了英国所担负的责任之时就阐述道：“我们已获取了我们想得到的——或者更多的东西。我们唯一目标是保住我们已有的和生活在和平之中。”^⑥在1935年英国关于国防的白皮书上公然阐述道：“对大英帝国人民、疆域、城市、海外贸易和交通的首要和最有力的防护是由维持和平获得的。”^⑦英国是一战后的一个既得利益者，它的国家政策的动机就是维护这些既得利益，而维持和平是最好的方法，这在30年代英国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更显得极为迫切。

1933年10月，希特勒德国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联，这使英国等西方国家极为不

① 约翰·惠勒一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第221页。

② 斯蒂芬J·李：《欧洲史专题1789—1980》伦敦和纽约，1982年版，第225页。

③④⑤ 引自《第三帝国的兴亡》（二），第395、401—404、405页。

⑥ 保罗·肯尼迪：前引书，第27页。

⑦ 安德鲁丁·克诺泽尔：《绥靖和德国对殖民地的战后要求》，圣马丁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安。希特勒德国重整军备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它退出国联和裁军会议，这意味着它可能不顾凡尔赛和约的任何限制而进一步大规模重整军备，其他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或军事力量优势必然也要不断扩充军备，从而导致大规模军备竞赛。而军备竞赛将会引发战争，这是人们从一战前英德等国军备竞赛吸取的历史教训，英国更是牢记在心，竭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再次出现。外交大臣西蒙指出：英国需要“减轻德国对我们自己被扰乱的情感，把它引回圈内来，并用各种可能的方法阻止一个新的军备竞赛”^①。比较积极的选择办法有两种：其一是承认德国的军备平等，从而换取对希特勒军备力量加以一定限制。其二是通过国联用制裁的方法迫使德国作出让步。在当时英国内外交困、和平情绪笼罩举国上下的情况下，第二种方法是缺乏吸引力的。而第一种方法即和解的方法获得了英国政府大多数官员的支持，外交大臣西蒙认为：“德国的重整军备除了使用最激烈的措施是不大可能被阻止的……对此我相信，这儿或法国的公众舆论将不能容忍。如果德国试图去重新武装，她将重新武装。某些相互同意的重整军备或许比没有好。”^②随着1934年5月裁军会议的彻底失败和德国不断扩充军备迹象的显露，使英国不能不进一步考虑其国防、外交政策。1934年11月，关于德国重整军备的内阁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委员麦克唐纳德在其报告中指出：德国不仅撕毁了凡尔赛条约第五部分的条款，而且它正“突破由英国政府在1933年3月提交裁军会议草约中所建议的限度”。但要强压德国是不行的，“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强迫德国将没有成果，并且作为必然的结果，英法的安全问题将以尖锐的方式立刻呈现出来。这种形势随后很快地朝着英法结盟再伴随着为保护荷兰和比利时而作的一些特别安排这个方向发展”^③。这种导致结盟的结局是英国不想看到的，因为不仅对立集团的出现

会比较容易地滑向战争，而且意味着英国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在随后的内阁会议上，西蒙建议：“最好的路线将是意识到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的重整军备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最好不拖延地认识到这点以期通过承认其军备合法而换取一些有价值的条款。……其主要条件是德国为着裁军会议和国联的目的返回日内瓦”；并指出：如果德国继续受凡尔赛条约限制的话，让德国重回国联是不可能的，承认其军备合法化是为进一步谈判而迈出的第一步^④。内阁赞同了西蒙提交的备忘录。在12月的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认为对德军备平等的承认已不可避免，“对德国军备加以控制要比其继续失控好得多”，而且“常有一个危险，即德国会使其从凡尔赛条约第五部分条款的限制下解脱出来，从而同其达成交易就不可能了，导致不能达成全面的安排。这种形势将很严重，但仍未呈现出有什么选择。如果形势仅任其发展，德国将继续重新武装到她最终需要的任何程度”^⑤。经西蒙提议，此次会议还授权西蒙和艾登在1935年早些时候去柏林同希特勒商谈。从以上的历史档案记载中，不难发现英国在裁军会议失败后对德军的重整军备忧心忡忡，希望同德国达成某种协议，且不惜以承认德国军备合法化、废弃凡尔赛条约第五条为代价来换取同德国达成某种协议，对德国军备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

①② 引自安德鲁丁·克诺泽尔：《绥靖和德国对殖民地的最后要求》，第48、49页。

③ 引自理查得·兰姆：《飘向战争1922—1939》，W·H·阿伦出版公司版，瓦勒姆1989年版，第109页。

④ 引自安东尼P·亚当麦思维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乔治·阿伦协会，1977年版，第133页。

⑤ 引自理查得·兰姆：前引书，第110页。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当希特勒向英国提出以35%这个比例双方达成海军协定时,英国认为这是个机会,外交大臣霍尔认为:“……一个更好的协定是不能从德国获得了,而抓住目前的机会并确保德国签署一个协定是很重要的”^①。海军大臣埃瑞斯·蒙塞尔(Eyres Monsell)也在内阁会议上说:“海军官员满足并急切地〔希望同德国〕达成一个协定。”^②于是英国很快就同德国达成海军协定。在英国看来,这样不会使德国在军备等方面失控,从而可以避免大规模军备竞赛,特别是可以避免一战前英德海军竞赛的局面。霍尔和海军大臣均认为“缔结一个协定是重要的,它将使我们控制德国的海军军备计划,而取代可能出现的英德在海军军备方面的竞争的抉择”^③。除此之外,英国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英国通过此协定限制德国舰队的规模,以便能从德国沿海和北海抽出一些舰只派往新加坡和地中海水域,以加强那里的海上力量。在远东,日本不断扩张,更令英国关注的是1934年日本宣布它不再受华盛顿会议和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规定的限制,竭力扩大其海上力量。英国军事参谋部在向内阁的报告中说,对远东帝国的保卫依然是最大和最近期的义务^④。英国为了确保其在远东的利益,正考虑抽调一部分舰只去远东。而立此协定,“英国似乎摆脱了不得不同时间面对德国和日本无限制海军野心的恶梦”^⑤。而且,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一直有所图,到1935年就更表面化。签订海军协定之前,霍尔明确表示他对由于远东和埃塞俄比亚冲突带来的威胁的关注和向远东派遣舰只的必要性。其二是英国把此协定看作是达成空军协定以致做出全面安排的第一步。德国公开宣布其空军的存在和扩大陆军之后,英国对德国的军备发展尤其是空军很担心,企图达成一个总的安排。在1935年3月英国就德国单方面违反凡尔赛条约军事条款而发出的抗议书中就建议达成“一个在德国和其他列强之间

自由谈判的总解决办法和关于军备的协定,此协定对于德国将取代凡尔赛条约的第五条款”^⑥。西蒙也说:“欧洲的真正希望是:联合王国做好必要的准备以防护自身的同时,它仍要寻求一种德国能平等分享的安排的政策”^⑦。在柏林会谈时,希特勒在提出海军协定的同时,流露了赞成达成一个空军公约的意向,因而英国试图以海军协定为开端,向着英法在1935年2月公报中所阐述的总安排方向迈进。

由上可知,英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在既想维持和平,又不愿承担义务和动用武力的思想状态下,面对德国的扩军备战,试图同德国达成某种形式的协定,以承认其军备平等为代价来换取某些有价值的条款,从而对德国军备加以一定的限制。英德海军协定就是这种动机的产物。通过此协定,在英国看来,既可避免一战前大规模海军军备竞赛,限制德国海军的规模,同时使英国有可能在必要时抽调部分舰只去远东。更为重要的是,英国试图达成一个总的安排,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当然,英国的根本动机是维护其国家利益,这也是每个国家制订政策时所遵循的。

四

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就字面意义而言,英国似乎占了上风。如果此协定被遵守,德国的海军军备将受到限制,这是英国愿意达成此协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②③ 引自理查德·兰姆:前引书,第117页。

④ 克思·罗宾斯:《绥靖》,纽约贝恩尔·布赖克威尔,1988年版,第44页。

⑤ 引自安东尼P·亚当麦思维特:前引书,第48页。

⑥ 引自安德鲁丁·克诺泽尔:前引书,第102页。

⑦ 引自沃尔夫冈丁·毛姆森和罗萨尔·凯腾艾克:《法西斯挑战和绥靖政策》,乔治·阿伦协会,1983年版,第108页。

此协定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规定德国舰队的总吨位不超过英帝国海军总吨位的35%，并且双方都把该协定称作“成为两国政府间永久和最终协议的协定”^①。这一提议是希特勒率先提出的，表明德国无意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英国对此极感兴趣。因为一战前两国海军的比例是16：10，而现在希特勒所提议的比例不仅使英国皇家海军占着明显的优势，而且德国在海军吨位上仍比法国低15%。正如霍尔所言：

“这个协定从海军的角度看来，显然将有利于其他海军国家，包括法国在内。”^②对于此比例，相对于当时德国海军的现存力量和发展速度似乎是高了些，丘吉尔评论道：“这一规定可以使德国实行建造新舰的计划，使德国的造船厂开足马力至少也要干十年。”^③英国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但德国不再让步，并威胁要停止谈判。在此情况下，英国担心，“如果我们现在拒绝同意为商讨目的而作的提议，赫尔·希特勒将收回提议，德国将寻求建造到比35%还高的水平上”^④。因此就同德国达成了协议。需要指出的是，从长远看来，这个永久不变的比例对德国还是一种限制，而英国在制订对德政策时就是着眼于未来的，早在1934年2月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中就指出：德国才是真正的威胁。“我们认为德国是最大的潜在敌人，我们的长远防御政策必须针对这个敌人”^⑤。而且从情报系统获知希特勒计划建造一支最终能扮演全球角色的舰队。在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情势下，谁能料到战争会在4年后如此迅速地爆发呢？

协定中值得争议的另一点是关于潜水艇的规定，它实际上允许德国可以拥有同英国一样多的潜艇数额，这使人们感到疑惑，不禁要问：英国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让步，难道英国人忘记了一战时期德国潜水艇给英国海上运输线带来的巨大威胁吗？在探究其因时，一些学者或认为英国急于同德国达成

35%比例的协定而忽略了关于潜水艇的规定，或认为英国对德国早已秘密制造潜艇估计不足，没有想到德国的潜艇建造发展如此之快。对此笔者认为不尽然，事实上英国对潜水艇规定的后果并非漠然。1935年7月19日海军大臣就在内阁会议上指出：“关于潜水艇的规定是最可能被批评的。”^⑥英国之所以同德国达成这样的潜艇协议，是有三点原因的：

第一，英国出于自己岛国防御的需要，海军发展的重点在于海面舰只，而潜艇数量相对很少。即使让德国达到同等的数额，也并不能构成真正威胁，相反，如果德国遵守此规定的话，德国的潜艇发展将受到限制。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军备时，总是根据自己的地理特点和最有可能受到的威胁来有重点地进行的。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且不说赢得一场战争，就是要求得生存，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保证各种物资能通过大西洋航运至大不列颠群岛，因而保护这条海上生命线就成为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保护任务，英国就必须重点发展更适于海面护卫的海面舰只，以形成优势来对付敌人的袭击，保卫商船。在保卫海上航线方面，潜艇并不是合适的战斗武器。出于这样的缘故，英国的潜艇数量到二战前夕仍不多，仅59艘，远少于法国。正是因为如此，德国内部诸如海军将领卡尔·邓尼茨等人对英德海军协定中关于潜艇的规定并不满意^⑦。二战期间，德国潜艇对盟军大西洋航线构成了很大威胁，那是因为希特勒德国撕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2页。

②③ 温斯顿·丘吉尔：前引书，第207、202页。

④⑥ 引自理查德·兰姆：前引书，第116、117页。

⑤ 引自基恩·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3页。

⑦ 见卡尔·邓尼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页。

毁了此协定，早已突破了协定规定的数额比例，正如德国历史学家阿斯曼和格拉迪施所言：“也许正是在潜艇的建造方面，德国最不遵守德英条约的限制。”^①

第二，英国已发明了声纳测位仪，从而使其对潜水艇价值的看法大大下降。英国对此仪器充分抱有信心，认为用这种装置可以测定距离几千米远的水下潜艇位置，因而潜艇的作战能力大大下降了。这种观念蔓延开来，以致英国海军部在1937年给英国护航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潜艇再也不会象1917年那样给我们造成困难了。”^②这种看法在德国海军中也有影响，在1934—1935年的德国潜艇学校里，许多教官告诫学员在水下进攻时要远离敌舰^③。

第三，德国在潜艇战方面作出了承诺。在谈判过程中，德国表示承认1930年伦敦海军协定所规定的关于潜艇战的条款，而这些条款对潜艇战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

英国的外交家们是经过考虑后订立此协定的，他们不会忽视条约中的每一个细节，也不会订立一个在他们看来对英国不利的协定。只要希特勒遵守这个协定，他或迟或早地要受到《英德海军协定》的限制。

五

1935年4月英国和法国、意大利结成了斯特莱莎阵线，而仅仅两月之后，英国又和德国签订了海军协定。表面看来，英国政策似乎前后矛盾，然而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我们发现英国对德政策是前后一致的，并不矛盾。

首先，必要时对凡尔赛条约进行一定的修正，是英国20年代以来的一贯外交政策。凡尔赛条约虽然缔结，但英国认为对德处罚过重，这是造成欧洲局势紧张和和平受到潜在威胁的症结，所以为维护和乎，英国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采用了修正的外交政策。一位法国作家在1922年发表评论说，英国“从

凡尔赛和约缔结起就是修正者”^④。到了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希特勒又大肆以凡尔赛和约煽动民族情绪，英国许多人谴责凡尔赛条约的不足，认为它从一开始就对欧洲的稳定发生了不良的影响，因而以维护和平为首要目标的英国对德执行和解政策，修正凡尔赛条约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裁军会议失败后，英国力图承担“诚实的掮客”这个角色，来调和法德矛盾，一方面站在法国一边谴责德国重新武装，破坏凡尔赛条约，另一方面又竭力防止同德国决裂，并谋求达成协议。这在执行过程中似乎就呈现出矛盾的现象。英国要担当法德中间调解人，就必须保持同两国接触，在当时情况下对德国更要如此。西蒙在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前夕就指出：“保持同德国的联系是重要的，既因为它的参与对国联宪章是重要的，也是作为确保它自己不独自重新武装或弃绝凡尔赛和约的最好办法。”^⑤英国一直在寻求同德国达成协议，希特勒提出订立海军协定的要求，35%的比例对英国很有吸引力，英国决定同德国会谈来达成一个协定。在参加斯特莱莎会议之前，英国专门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考虑在此次会议上的政策，最终确定：“……我们的路线必定是我们同德国完全决裂，并除威吓它之外不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建议我们要尽所有可能确认我们对洛迦诺的义务，并强调表达我们执行条约的意向而不加入更特定的、对履行条约的保证”^⑥。首相鲍尔温也在致西蒙的电报中指出：“在理论上保留条约立场的同时，我们将和一个已破坏条约的德国人会

① P.A.施泰尼格尔：《纽伦堡审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5页。

②③ 卡尔·邓尼茨：前引书，第24、25页。

④⑤ 安德鲁丁·克诺泽尔：前引书，第23、48页。

⑥ 引自安东尼P·亚当麦思维特：前引书，第137页。

谈。”^①可以说，英国在斯特莱莎会议上的政策的目标是获取法意的信任而又不孤立德国。故斯特莱莎会议上，英国一直唱低调，当法国提议通过国联对德国实施经济制裁时，西蒙则强调实施制裁的困难，并以制裁日本为引证，法国只好建议在进一步发生德国破坏条约时应考虑制裁。此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宣言，结成了形式上的斯特莱莎阵线。英国由于既定的政策，它没有任何采取实际行动去维护此阵线的意图，所以很快它就和德国达成了海军协定。既然如此，英国为何又签署宣言呢？原因在于英国为充当和解人执行两面政策的需要。面对德国公然单方面破坏和约，英国虽不愿同德国决裂，但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作出姿态，以安抚法、意等国，而且这种形式上阵线的结成对希特勒德国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压力，可以为即将举行的英德伦敦谈判加重英方的砝码。

其三，英国对斯特莱莎宣言有着自己的理解。英法是斯特莱莎阵线的两个组成国，是凡尔赛条约的主要维持者，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面对德国的崛起，两国都力图维护和平和自身安全，但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手法：英国主张对德和解，法国则主张对德强硬。对于法国的对德强硬政策，英国不以为然，认为这样不但不能维护和平和自身安全，相反只能加剧双方对抗，使德国进一步撕毁凡尔赛和约，并认为法国的强硬政策是裁军会议失败的主要原因。裁军会议失败后，德国一直“疯狂地重新武装陆军和空军，而巴都或其他人方面并没有提出抗议”^②。因而英国认为法国并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限制德国的军备^③。1935年2月英法双方达成妥协，发布了联合公报，同意要达成一个“东方洛迦诺公约”和空军公约，并按照关于安全制度中权利平等的原则，“达成关于一般军备问题的协议……以代替凡尔赛条约第五部分有关目前限制德国武装和部队的规定”^④。英国同德国签订海军协定时，它认为承认德国军

备平等权利是公报中已确认的，而且承认的也是既成事实，并把此协定作为缔结空军协定进而作出一个总安排的第一步。霍尔就说：

“而我们所订立的协定，我们认为它不但不会妨碍，而且一定会促进全面的协定，否则我们绝不会订立的”^⑤。在英国看来，这仍是为了裁减军备和维护和平这个目的，是符合英法联合公报和斯特莱莎宣言精神的。英国之所以没有在斯特莱莎会议上告诉法、意关于英法谈判的事情，是因为这样做“将大使局面复杂化”^⑥。况且，抛开以上不讲，“……于海军问题，向来和陆军、空军的裁军问题分别处理。海军问题向来是单独处理的，……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向来是海军国家的意图”^⑦。

英国自命法、德调解人的角色决定了其政策的两面性，从而在历史现象上给人们一种矛盾的感觉，但当我们揭开历史的表象，从表象的背后去探寻答案时，我们会发现，在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英国的政策却是前后一致、符合逻辑的。

《英德海军协定》是英国迈向绥靖政策的前奏。实事求是地说，英国缔结此协定的动机从根本上来讲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但从前文分析可知英国并非一味从损害他国的利益出发的，它缔结此协定是为了试图对德国的重整军备加以限制，来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和平。但后来的发展证明英国的外交政（下转第88页）

①⑧ E.L.伍德沃得和罗恩·巴尔特编：《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二卷，第919、919页。

② 理查得·兰姆：前引书，第109页。

③ 汉斯W.盖茨克编：《两战之间的欧洲外交1919—1939》，四角丛书，芝加哥1972年版，第147页。

④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27页。

⑤ 温斯顿·丘吉尔：前引书，第207页。

⑦ 引自温斯顿·丘吉尔：前引书，第207页。

紧张气氛方面，它起了虽非关键但却重要的作用。

四 如何评价《李顿调查报告》

关于《李顿调查报告》，中外学者的观点也大为相左。英国学者对它大加赞誉，“公正”、“正义”之类的词藻屡屡出现^①。而中国学者大都持否定态度，认为该报告“集中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同日本的勾结和争夺”^②。

我认为，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从道义上而言，从1932年5月~1933年3月间，英国对日推行的“平衡政策”及其产物——《李顿调查报告》，是应受到批判和指责的。作为一个帝国主义殖民大国，英国是不尊重中国主权的，它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表明出一种漠然。当日本以退出国联来威胁西方干涉和舆论谴责时，英国担心的是“……如果日本退出国联，国联在公众心目中会受到损伤”^③。《李顿调查报告》中，在多处无视和损害中国的利益和地位。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当时的现实，即：日本完成了对东北的占领，南京政府的抗日意识消沉，中国军队已撤入关内，大规模的有效的军事抵抗在东北已基本停止。因此，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以及防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所以，英国的政策和调查报

告在客观上对中国具有颇为有利的积极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在法律上否定了日本侵略行为的合法性，使日本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受指责的被动地位。为此，日本大为恼怒，宣称日本的政策“与国联的见解完不全同”，拂袖离国联而去。

对于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以期得出客观和科学的评价。

〔作者王宇博，1960年生，江苏教育学院讲师〕

① 参见Roger Louis “British Steategy j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1921; A. Clagtor, “The British Empire As A Superpower, 1919~1939”, Macmillan, 1986; W. N. Medticu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Versailles”, London, 1940; M. D. Kennedy, “The Estrangment of Great Britain and Japen”, California, 1969; F. S. Northedge, “The League of Nation— its life and times, 1920— 1946”. Leicester, 1986; J. D. Doenecke, “ The Diplomacy of Frustrati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of 1931 ~1933”, California, 1981; D. B. F. P. Vol. X and XI;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 Crisis of 1931~1933.” London, 1972; Ian Nish, “Angle— Japanese Alienation, 1919~1952.” Cambridge, 1982, etc.

② 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2页。

③ D. B. F. P., Vol. XI, No. 202.

（上接第84页）

策失败了，并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这是英国在回旋余地不大的情况下作出了一次错误的政策抉择，其主要的教训是对形势判断错误，轻信了希特勒。英国希望通过初步和必要的迎合来达成协议，以束缚希特勒的手脚，并将它重新纳入维护欧洲安全的一个多边体系中。而希特勒却认为：放弃同英国的海军竞

争和殖民政策是实现同英国结盟、破坏集体安全的第一步，再进而谋求英国承认其在欧陆的“自由”行动。英国却没有很快认识到这点，一味地推行其绥靖政策，等到英国开始意识到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了。

〔作者袁征，1968年生，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1级研究生〕